七日談（澳門篇）

如何構建澳門學：從書齋走向社會

吳志良

一門學科的生命力，不僅在於其理論的自洽，更在於其能否在實踐中扎下根、開出花、結出果。澳門學從一九八六年萌生至今，經歷了從概念討論到學科建設的跨越，但距離成為一門成熟的、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自主知識體系，仍有漫長的路要走。如何構建澳門學？這是擺在澳門學術界面前的一項緊迫課題。

構建澳門學，需要從以下五個方面協同推進。

一、深化共同學術信念，凝聚價值共識

構建澳門學的首要前提，是澳門學術界對這門學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形成共識。過去幾十年，澳門研究雖取得長足進展，但研究者往往分散在不同學科領域，各說各話，缺乏統合。要真正建立起澳門學，澳門學術界必須首先體認到，澳門不只是一個研究對象，更是一個具有獨特學術價值的「知識單元」；澳門學不是現有各學科研究的簡單拼盤，而是對澳門知識的系統整合與理論昇華。

這種共識的形成，需要學界同仁在三個意識上達成一致：一是問題意識，即明確澳門學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什麼；二是範式意識，即確定澳門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和解釋框架；三是目標意識，即清晰認識到澳門學建設最終要服務於什麼目的——在我看來，這個目的就是建立澳門歷史的宏觀敘事，總結澳門社會的發展規律和「一國兩制」實踐的成功經驗，為澳門的未來發展探索道路、制度和理論。只有當澳門學界在這些基本問題上形成共識，澳門學才能從「各美其美」走向「美美與共」，從分散的研究走向有組織的知識生產。

二、確立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

澳門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，其研究方法必然是多元的、跨學科的。然而，多元不等於隨意，跨學科不等於無邊界。如何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，探索出適合澳門學研究的範式和路徑，是科學建立澳門學學科的關鍵。

當前，澳門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，是基礎研究和田野調查的相對薄弱。在一些領域，研究成果的深度明顯不足。除了現代化統計體系起步較晚的客觀原因外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實證研究重視不夠，造成了「厚古薄今」的狀況。加強基礎研究和田野調查，為現實發展提供實質的智力支撐，是當前澳門學建設必須補齊的短板。

與此同時，我們還要重視科學方法論的教育與傳承。培養多學科的研究人員，建立多學科的研究團隊，共同探討澳門學的研究方法，推動澳門學在一個規範的軌道上成長。只有這樣，澳門學才能經得起學術的檢驗，才能真正建立自主的學術體系。

三、追求有意義的知識增量

在學術和知識體系的構建過程中，固然要追求知識的增量，但更重要的是追求「有意義的知識增量」。所謂有意義的知識增量，就是產出的知識要有質量、有深度、有解釋力，而不是簡單的數量堆砌。

澳門學術界長期存在一個現象：研究課題重疊、結論重複，知識產出顯得支離破碎。這往往是因為研究者基於種種原因和局限，選擇了「以量取勝」的道路，而非深耕細作。結果，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淪為某種堆砌和湊合，難以形成真正有影響力的理論框架。

要改變這種狀況，我們需要在開展研究時便重視研究發現，設法進一步解答研究過程中延伸出來的問題，盡量壓縮學術研究結論的階段性。這並不表示我們追求一勞永逸——學術研究從來不會有終點——但純粹追求知識增量而不重視知識素質，只會使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原地踏步。只有科學嚴謹的研究方法，才能產生高質量的知識增量；只有高質量的知識增量，才能支撐起澳門學的學科大廈。

四、加強人才培養與學術梯隊建設

任何學科的建設，歸根結底要靠人。澳門學的構建，需要一支有情懷、有學養、有方法的研究隊伍。

目前，澳門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仍存在階段性、間歇性、業餘性的現象。儘管研究隊伍逐漸壯大，但就某一問題進行長期系統跟蹤研究的人並不多。許多研究隨興趣而起、隨項目而止，難以形成持續深入的知識積累。

澳門學的建設，需要培養一批甘坐冷板櫈的學者。這要求在高等教育層面，加強澳門學相關課程和專業的設置，吸引更多年輕人投身澳門研究；在學術梯隊層面，注重老中青結合，發揮資深學者的傳幫帶作用，同時為青年學者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；在研究機制層面，鼓勵長期跟蹤研究，支持跨學科協作，推動形成穩定的研究團隊。



▲旅客在澳門大三巴牌坊前遊覽。 新華社

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每年舉辦的暑期實習生計劃，就是一個值得推廣的嘗試。它為大學生提供了了解研究機構工作的機會，為培養年輕一代研究人才創造了條件。未來，需要更多這樣的平台，讓澳門學的薪火代代相傳。

五、推動學術成果的社會轉化

澳門學的生命力，不僅在於學術殿堂內的精深探討，更在於它能否走出書齋，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動能。

當前，澳門學術團體智庫功能的強化，正是澳門學走向實踐的重要體現。澳門的高等院校和學術團體近年積極搭建學術與政策之間的橋樑，通過指數發布、政策評估、民意調查、公眾講座等形式，將知識成果轉化為社會治理的工具，提升了澳門社會科學研究的現實影響力。

展望未來，澳門學的社會轉化還有更廣闊的空間。一方面，要進一步深化與特區政府部門的合作，使學術研究成果更直接地服務於科學決策；另一方面，要更充分地發揮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優勢，將澳門學的學術成果推向國際舞台，提升其國際影響力。澳門學不僅要「引進來」，更要「走出去」——以澳門獨特的文明對話經驗，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。

善治若水

胡恩威

最美的圖書館

中國人從前不叫圖書館，叫藏書樓。寧波的天一閣，名字取自「天一生水」，范欽把防火的祈願砌進了磚木裏，樓前掘池，書在樓上，水在樓下，彷彿書籍本是怕火的生靈，需要一泓安靜的克制來守護。家規極嚴，「代不分書，書不出閣」，外人不得踏進半步。黃宗羲是第一個破例登樓的外姓人，他寫《天一閣藏書記》，開篇便嘆：「讀書難，藏書尤難，藏之久而不散，則難之難矣。」那一角藏書樓，是文明的火種在潮濕的江南獨自燃燒，明亮，卻也孤獨。

佛寺裏的藏經閣，是另一種藏。它通常立在大雄寶殿之後，是寺院最安靜的縱深，被稱作「寺院的圖書館」，藏《大藏經》，也藏佛像、法器與歷代珍寶。經卷或沿壁立櫃，稱「壁藏」；或依壁起樓，稱「天宮藏」。但那裏的「藏」，帶着神聖的密閉，經典被束之高閣，塵封日久，普通人不輕易得見。藏經閣的莊嚴，恰恰來自它的不開放——知識被供奉，卻不被翻閱。這是圖書館史上一個意味深長的悖論：保存得越完整，傳播得越稀少。

西方在拿破侖那裏，圖書館的觀念轉了一個彎。一七九九年，有人建議關閉公共圖書館，他斷然拒絕，說：「我絕不容許剝奪像我以往那樣貧窮的人的這種享受。」他未必是民主的信徒，但他把圖書館從宮廷與修道院的壟斷裏拉了出來，使其成為一個「公共參與享用」的地方。知識不再只屬於藏它的人，也屬於需要它的人。

大學圖書館則站在另一極。牛津的博德利圖書館，入口處的拉丁銘文寫着，它是為「博學者」而建。錢鍾書留學時稱它「飽蠹樓」，把自己讀成一隻沉潛書山的書蟲。那裏不僅是藏書的倉庫，更是一座「知識的神殿」——穹頂、石牆、閱覽室的長桌，共同構成一種近乎宗教的儀式感：人在書面前低頭，不是因為被強迫，而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站在無數世代累積的智慧面前，理應謙卑。

美國國會圖書館把這種神殿感推向了帝國的尺度。傑弗遜大廈一八九七年向公眾開放，大廳的彩色玻璃天花板與大理石階梯，讓一座圖書館看上去比許多教堂更接近天國。它的藏書從最初的七百四十冊，長成今日一億多件，書架相連，長達八百多英里。博爾赫斯說，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。站在那個穹頂之下，你很難不同意。

但最美的圖書館，或許終究要回到一個極小的角落。一九一八年，一個從湖南來的年輕人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得一份登記報刊與閱覽人姓名的差事，每月八塊錢。他每天坐在那張桌子後面，把新到的報刊記下，把來閱覽的人名寫下，順便讀到了那些他從前在鄉間讀不到的雜誌與主義。圖書館給他的不是一座殿堂的宏偉，而是一角桌面的寬度——恰好夠放下幾份報紙，和一個青年正在形成的世界觀。北大紅樓的一張登記桌，都是圖書館真正發生的地方：一個人，與一本書，在安靜中相遇。所有的建築、穹頂、藏量與制度，最終都不過是為了守住這一角，讓它不被風雨侵蝕，不被權力關閉，也不被時間過早地帶走。

【大公報人物誌⑯】



朱啟平

朱啟平原名朱祥麟，一九一五年生於上海，祖籍浙江海鹽。一九三三年朱啟平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科，在校期間他參加了「一二·九」運動，並擔任學生領袖。「七七事變」後，他輾轉至重慶，先後在《新蜀報》和《國民公報》工作，一九四〇年秋加入《大公報》重慶版，先後任夜班編輯、外勤記者。他進入《大公報》不久，被派往昆明，採訪滇緬公路通車的新聞。

一九四四年朱啟平被任命為《大公報》派駐美軍太平洋戰區的隨軍記者。一九四五年三月，經印度、錫蘭、澳洲，再經太平洋諸島輾轉抵達日本關島。他參加了美軍的硫磺島之戰、沖繩之戰、塞班島戰役等重大戰役，與美軍官兵同吃同住共進退，採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報道，比如《硫磺地獄》《琉球兩周》《塞班行》《鷹揚大海》等。朱啟平還原了美軍士兵在「泰康提羅加」號航母上的生活與戰鬥，是當時唯一報道美國航母戰鬥場景的中國記者。

「從關島到硫磺，從硫磺到琉球，從琉球到日本本土，這寸寸血汗的殺奔東京的道路上，我親身經歷了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血肉的鬥爭。我和美國兄弟們一同居住，一同呼吸，一同躲在墓穴裏躲避敵人的炮彈……我的同伴雖然時常變遷，這個倒下去，另一個補上來，而他們的熱情和英勇卻是相同的。」

在沖繩島工作時，朱啟平住在與機場隔一條公路的帳篷裏，在一個月夜，一名日軍神風突擊隊員誤將公路看成機場跑道，俯衝掃射，子彈打在他身旁，像「夏天暴雨驟至，大雨點打在毛灰地上」，為躲避襲擊，他們躲進當地人的墓穴，伴着骨殖過了一夜。


◀朱啟平

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，二十九歲的朱啟平作為大公報記者，在東京灣「密蘇里」戰列艦上目擊了日本投降簽字的全過程。他把簽字流程、現場細節寫得清清楚楚，結尾一句「舊恥已去盡，中國應新生」曾廣為傳誦。

他寫的通訊《落日》後來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和大學新聞專業教材，被公認是報道二戰日本投降儀式的經典之作。他寫到了別人也許忽略的細節，「全體簽字畢，麥氏和各國首席簽字代表離場，退入將領指揮室。那時是九點十八分，九一八！（民國二十二年日本強迫我們和偽『滿』通車通郵，那第一班從關外開北平的車，到站是九點十八分。意思是『九一八』到北平。據此，我們可以說，『九一八』回日本。啟平附志。）」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，《大公報》上海版率先復刊，翌日就在第二版刊發了朱啟平採寫的長篇通訊《落日》。

一九四六年朱啟平和震旦女子大學教員孫探微結婚，不久他被《大公報》派往紐約，擔任駐美國及聯合國記者，報道戰後的國際動向。一九四九年一月，朱啟平夫婦經馬尼拉歸國，定居北京，一九五一年他自願報名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兩次赴朝鮮戰場採訪，直到板門店和談結束他才返回北京。

一九五七年他被錯劃為「右派」，下放到北大荒，一九六〇年被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張家口外語學院教英文。一九七八年他恢復記者身份後，回到香港《大公報》任編輯部副主任，朱啟平曾在《大公報》工作三十年。一九七九年他隨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歐洲四國，寫下了《偉大的平凡》《索爾本近鄰漫筆——從居里夫人聯想到的》等通訊，發表於《人民日報》和香港《大公報》等，著名記者彭子岡讀了之後寫信給朱啟平說，「（《偉大的平凡》這篇通訊）我讀了不下十遍，你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。」

一九九〇年朱啟平夫婦隨其子女移居美國加州，一九九三年病逝，享年七十八歲。朱啟平始終認為「文字是第二位的」，他說「寫稿，你是根據看到的、聽到的、體會到的、深有所感的，以盡可能簡練清順的文字，宣洩紙上，很難說要根據什麼規章才能動筆。」

文化什錦

斯雄

「百寶丹」記（上）

有一次，我問一位老雲南人：「您能隨口說出一種在國內國際都有名、屬於雲南本土獨有的品牌產品麼？」

對方思忖半天，答不上來。

「雲南白藥算不算？」

對方一臉驚喜，連說「是的呀、是的呀」。

稍加留意會發現，身邊人遇到跌打損傷、瘀血腫痛等情況，只要不是很嚴重，通常不會去醫院，直接弄點兒雲南白藥，外敷止血消炎，內服活血化瘀。用法不複雜，方便實用，很生活化，經常被當成「居家必備」藥品。

生活中，這樣的情況司空見慣，也由此可見雲南白藥的親民性和知名度。但如果要細究其傳承的風風雨雨，可能很多人並不知情。一旦了解，定會更加肅然起敬。

雲南白藥由雲南民間醫生曲煥章於清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年）創製，起初稱曲氏白藥，後起名「百寶丹」，再後來定名為「曲煥章萬應百寶丹」。

那個年代的品牌，流行冠以「百」「萬」之類很誇張的標籤，以吸引眼球。比如萬金油，為出生於緬甸仰光的南洋華僑傳奇人物胡文虎、胡文豹兄弟一九〇九年所創製，全稱為「虎標萬金油」；再比如「巴拿馬萬國博覽會」之類。

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年），曲煥章將白藥呈送雲南省警察廳衛生所檢驗合格，列案為優，允許公開出售。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年），白藥由紙包裝改為瓷瓶包裝，行銷全國，銷量驟增。

醫藥的口碑都是慢慢積攢下來的，做不了假。曲煥章最初專攻的是跌打損傷與外傷，而槍傷、刀傷、摔傷、嚴重瘀血等在戰場上更為常見，白藥的用武之地更大。

曲煥章的醫者仁心以及「百寶丹」的神奇療效，受到當時主持滇政的雲南都督賞識。一九二五年，曲煥章被聘為東陸醫院滇醫部主任兼教導團一等軍醫正。

在雲南陸軍講武堂歷史博物館裏，有學校醫務室的場景復原，立有曲煥章銅像。當年醫務室主要採用的醫術為中醫，其中包括中藥藥房。曲煥章是講武堂的一等軍醫官，曲氏白藥成為醫務室藥房標配。

一九二七年，曲煥章將「百寶丹」正式定名為「曲煥章萬應百寶丹」，設計了「一藥化三丹一子」方案，即普通百寶丹、重升百寶丹、三升百寶丹及保險子，並發明了重傷者先服用保險子的療法，完善並增強療效。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年），「曲煥章大藥房」在昆明金碧路建成開業。

「百寶丹」真正廣為人知，是在抗戰期間。

一九三七年「七七事變」後，六十軍出滇北上抗日，曲煥章主動捐贈「百寶丹」三萬瓶。「百寶丹」作為滇軍「隨身三件寶」之一，征戰台兒莊戰場，滇軍將士發現，「百寶丹」對槍傷、刀傷有奇效，「止血快」「疼痛減輕」「傷口癒合好」。「百寶丹」由此名聲大振，與抗日熱潮一起傳遍全國，一時間供不應求。

在波譎雲詭的大時代漩渦裏，一旦出名，很容易被裹挾而無法自保。台兒莊戰役之後不久，曲煥章不幸在壓力、憤懣、疾病交織中離世，去世前，他將秘方傳授其妻繆蘭瑛。繆蘭瑛隨後繼續在昆明經營「曲煥章大藥房」，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。